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牟 歆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并非创作于一时,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献给汉武帝的只是初稿,其后司马相如在元朔(前128—前123)甚至元狩(前122—前117)年间还对其进行了多次加工和修改,最终的定稿被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建议,也是司马相如后期加工的结果,并成为了《封禅书》的萌芽。

关键词: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成赋过程;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6-0144-07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在赋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其创作的时间、成赋的过程,历来聚讼纷纷,未有定论。而对赋中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思想与《天子游猎赋》成赋过程之间的关系,也较少有人论及。兹就此几个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新论

现今学术界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作于建元二年(前139)至建元三年(前138)之间^{[1]21};第二,作于建元四年(前137),而奏赋于建元末年(前136—前135)^{[2]125};第三,作于建元五年(前136)^{[3]233};第四,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左右^{[4]90};第五,作于元光元年(前134)^{[5]145};第六,作于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之间^[6];第七,《子虚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秋稍前,《上林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底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稍后^[7]。

以上七种观点,均有所依据,将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的最迟年限定在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但通过对《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天子游猎赋》的梳理,可以发现至少三处疑点。这三处疑点似乎都显示了《天子游猎赋》的最终定稿是迟于元光元年(前134)的,甚或已在元狩年间(前122—前117)。

第一处疑点为赋中描写上林苑中瓜果时,提到“樱桃蒲陶”^{[8]3208}。

“蒲陶”,就是葡萄。裴骃《集解》引郭璞曰:“蒲陶似燕蕒,可作酒也。”^{[8]3209}葡萄原产于西域,并非中原物种。葡萄传入中原当是在西域与中国大规模交往之后。正如刘跃进先生所言:“西域与中国相通不始于汉武帝时代,但是中国与西域大规模的交往却是始于张骞通西域的建元三年(前138)。”^{[5]146}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张骞以建元三年(前138)出发,历时十三载,两陷匈奴,于元朔三年(前126),方趁“单于死,左右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8]3159}。此时,汉朝方知有大宛国。所以,司马迁在《大宛列传》开头便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8]3157}也只能是在此之后,汉朝始与大宛频繁交往,汉朝人才

收稿日期:2015-12-23

作者简介:牟歆(198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

能知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8]3157}，也才能有“汉取其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8]3157}的记载。而“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8]3157}，甚至在上林苑建造葡萄宫^①，则又当是太初四年（前 101），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国王首，得汗血马归来之后的事了。

总之，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 126）以前应当是不知道葡萄的存在的，也就必然写不出“樱桃蒲陶”这样的句子了。

第二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天子射猎时，说到“孙叔奉饗，卫公骖乘”^{[8]3033}。

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孙叔者，太仆公孙贺也。卫公者，卫青也。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8]3033}司马贞《索隐》亦曰：“孙叔，郑氏云太仆公孙贺。卫公，大将军卫青也。”^{[8]3033}即，孙叔就是指太仆公孙贺，卫公就是指大将军卫青。

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年表》载，公孙贺于建元六年（前 135）始任太仆，三十三年后的太初二年（前 103）闰月丁丑，迁为丞相^{[9]768,784}。那么，在建元六年（前 135）以前，司马相如是不可能知道公孙贺是太仆的。

又，《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云：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8]2925}

则可知，卫青为大将军已在元朔五年（前 124）汉军大出、击溃匈奴右贤王之后。那么，司马相如在元朔五年（前 124）以前，也不可能知道卫青能当上大将军。

有学者以为卫青于建元末年已任太中大夫，贵幸于汉武帝，而公孙贺此时也已是太仆，这即可解释“孙叔奉饗，卫公骖乘”两句。但司马贞《索隐》云：“案：大驾出，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8]3033}《汉旧仪补遗》卷下亦云：“乘輿大驾仪，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10]104}则司马贞所言本为汉代的典章制度。而建元末年、元光初年，作为外戚的卫青，虽身为太中大夫，但尚无尺寸之功。如若此时的卫青为天子骖乘，就是逾制，只会招受非议和弹劾，又

怎么会出现在司马相如这样一篇充满颂扬之声的赋作之中？

可见，在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前，卫青尚未出任大将军，司马相如是不大可能写出“孙叔奉饗，卫公骖乘”这样的句子的。

第三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各种歌舞时，写到“文成颠歌”^{[8]3038}。

据司马贞《索隐》引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其县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即滇也。”^{[8]3039}按照文颖的解释，颠歌就是滇歌，滇国之歌。据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载，滇之立国源于楚威王时之庄蹻，“秦时常頰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8]2993}。则滇于秦时尚与中国交通，但自汉朝立国即已断绝。

又据《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云：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8]2995-2996}

也即是说，直到元狩元年（前 122），汉使才第一次到达了滇国。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隔绝，汉朝与滇才有了第一次交往。所以滇王不知汉朝广大，同样的，汉朝也不知道滇的情况。所以，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以前，汉朝与滇并无交往，司马相如也就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听闻过滇歌。

或言，元光六年（前 129），司马相如奉命开发西夷之时，或许已经得闻滇歌。即便如此，那也已迟于元光元年（前 134）五年之久。且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笮、犍、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8]3047}可见，司马相如最远只到了邛都，并未及滇。故其此时是否就能知道滇歌还需商榷。

总之，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以前，汉朝与滇

还处于隔绝的状态,司马相如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能听闻过滇歌,从而写出“文成颠歌”这样的句子。

当然,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曾批评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假称珍怪,以为润色”^{[11]74}。司马相如的赋作多有想象和夸张的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想象和夸张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事物感知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是司马相如根本没有见到或听闻过的,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创造不出来的。

以上三个疑点的存在,当可以证明《天子游猎赋》最后的定稿是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以后,甚至已经迟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当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还需弄清楚司马相如在此之前奏赋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赋奏,天子以为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8]3043-3044}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武帝方派司马相如入蜀责唐蒙。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在建元末、元光初曾献赋于汉武帝,并因此得以为郎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么,这岂不与之前的考证相矛盾了吗?

二 《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

要回答上述这个疑问,就需要对司马相如这篇赋的创作过程作一个系统的梳理。而事实上,这的确与《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息息相关。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描写了天子上林苑中之事。而司马相如第一次见到上林苑的景色和扈从天子射猎,都应是在汉景帝之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以贲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8]2999}武骑常侍一职,据司马贞《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8]2999}也就是说,司马相如此时的职责就是陪同天子射猎。

是时,恰逢梁孝王来朝。梁孝王于景帝时曾五次来朝,分别为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三年(前154)、七年(前150)两次和中元六年(前144)。在梁孝王这五次来朝中,司马相如应该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得见梁孝王,并与枚乘、邹阳、庄忌等人交往。因为梁孝王前两次来朝时,尚未爆发七国之乱,枚乘等人还在吴王刘濞处,梁孝王刘武也还尚未如之后一般贵幸。而中元六年(前144)冬,梁孝王来朝后,时隔半年,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六月即薨,时间短促,司马相如不可能在此之后方客游梁。所以,“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

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8]2999},此事只可能发生于汉景帝前元七年。

又,据《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记载: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8]2084}

此处所载的二十九年,为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当时,作为景帝武骑常侍的司马相如,正是在此时见识了上林苑的景色以及天子游猎的气象,为其之后创作《天子游猎赋》打下了根基。而也正是因为“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才使得司马相如得以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人交往,并因此病免游梁。

而此时的梁孝王,因为是景帝胞弟,且助景帝击破吴楚叛军,加之窦太后的宠爱,贵幸达到极点。“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8]2083}。司马相如客游于梁,时时侍从梁孝王游猎,耳濡目染之下,对天子游猎之事必然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观此时的梁王游猎,与观天子游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说,此时司马相如创作的《子虚赋》就是当时对梁孝王游猎景象的一个真实再现。这也为他日后向汉武帝进呈《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正如沈伯俊先生所认为的,“《子虚赋》是《天子游猎赋》的雏形,而《天子游猎赋》即是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作而成的”^[12]。

其后,梁孝王薨,相如归蜀。久之,方因狗监杨得意得见汉武帝。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8]3002},“赋奏,天子以为郎”^{[8]3043}。我们相信此时的司马相如的确进献了一篇《天子游猎赋》给汉武帝,否则《史记》的这处记载就失去了根据。而司马相如侍从景帝、梁王射猎的经历和多年以来的酝酿都足以支撑他完成这篇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天子游猎赋》是否就是当年司马相如献给汉武帝的那一篇?或者司马相如在献赋过后,会不会又对其作出一些修改和加工润色?

事实证明,这些猜想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首先,前文所讨论的现存《天子游猎赋》中出现的三处疑点,其本事均发生于司马相如献赋为郎之后,似乎就已经能够说明此赋在进呈给汉武帝之后还有过一系列的加

工。事实上,《天子游猎赋》的加工润色痕迹也并不仅仅只有上述三处而已。

其次,《天子游猎赋》描写上林苑的广大时道:“终始霸浚,出入泾渭;酆鄠潦漓,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8]3017}我们知道,景帝时的上林苑与武帝时的上林苑是不同的。景帝时的汉上林苑还是《三辅黄图》卷四所说的“秦之旧苑”^{[13]230}。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对旧有的上林苑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东方朔对此还进行过谏阻。其谏文曰:

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9]2849}

在东方朔针对汉武帝大建上林苑的谏言中,我们可以一窥上林苑扩建之后的规模。东方朔专门提到灊、浚、泾、渭、酆、镐诸河,就是为了说明这几条河流流经地区的物产丰饶,劝汉武帝不要夺天下之利而规以为苑。这正好证明汉武帝扩建上林苑的范围恰好是把这几条河流均包含在内了。再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所提到的上林苑的范围,灊、浚、泾、渭、酆、镐诸河,无一不在其中。这恰好可以证明司马相如赋中所描写的上林苑规模与范围和汉武帝扩建之后的上林苑极其吻合。然而,建元三年(前138)以前,司马相如还在蜀中,在献赋于汉武帝得以为郎之前也不可能进入汉武帝扩建过后的上林苑。那么《天子游猎赋》中所描写的上林苑之规模如此宏大,只能是其为郎之后,侍从武帝游猎,有了新的感受之后再加工改造的了。

复次,《天子游猎赋》还写道:“厯石阙,历封峦,过鵙,望寒露,下棠梨,息宜春。”^{[8]3037}石阙、封峦、鵙、寒露,据裴骃《集解》云:“骃案:《汉书音义》曰:‘皆甘泉宫左右观名也。’”^{[8]3037}棠梨,据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云:“宫名也,在云阳县东南三十里。”^{[8]3037}宜春,据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8]3037}又据《三辅黄图》卷四《苑囿》所载:“甘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仙人观、石阙观、封峦观、鵙观。”^{[13]239}张揖则明言:

“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9]2568}陈直先生考证说:“甘泉苑繁称为甘泉上林苑,或称为甘泉上林宫。因上林苑包括至甘泉地区,其在甘泉山部分,则称为甘泉上林苑。”^{[13]240}又,《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棠梨宫,在甘泉苑垣外云阳南三十里。”^{[13]205}《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张揖云:“棠梨,宫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9]2568}与之略同。

则可知,旧有的汉上林苑并不包括甘泉宫在内,而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才将甘泉宫纳入新的上林苑范围,故而甘泉宫才又被称为甘泉苑、甘泉上林苑或甘泉上林宫。而赋中的石阙、封峦、鵙、寒露四观也是汉武帝建元中扩建上林苑后才修建的。献《天子游猎赋》时的司马相如如何能够得知有此四观?又为何其所描写的上林苑范围已将甘泉宫包含在内?

且,《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云:“于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整屋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田,及其贾直,欲除为上林苑,属之南山。”^{[9]2847}也就是说,汉旧有的上林苑连宜春宫也没有包括在内,也要等到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才将其并入。

这一切都只能解释为司马相如在将《天子游猎赋》进呈给汉武帝过后,侍奉武帝为郎其间,还对其进行过后期的加工和修改。

再次,《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刘炫传》载刘炫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14]1722}刘知几《史通》卷九《序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15]256}则司马相如本有《自叙传》。而《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已死,家无书。”^{[8]3063}又可见其著作皆单篇流传,故《自叙传》与其他作品当分别各处。《史记》又载:“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8]3073}既然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文章有“采”与“不采”之分,那么可知司马迁著《史记》,乃采其《自叙传》为本,并加入其最为著名之文章,糅合以成《司马相如列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天子游猎赋》也是司马迁抄录的。司马相如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自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以来,两度为郎,侍从汉武帝左右凡十几年。其间随天子游猎上林之事,不可胜数。

其对最初献与汉武帝之《天子游猎赋》或觉有不尽人意之处,时而对其作出改动,也是文人常有之事。司马迁所抄录入《史记》的当是最终版本的《天子游猎赋》。

最后,这与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和文学思想也是密不可分的。《西京杂记》有云:“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16]卷二·4}其记载虽有戏说成分,但“几百日而后成”倒可能真是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之一。“几百日”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创作时间长。《西京杂记》又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16]卷三·6}又据《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附《枚皋传》云:“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9]2367}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相如含笔而腐毫。”^{[17]494}《太平御览》卷八十八《皇王部·汉孝武皇帝》引《汉武故事》云:“(上)好醉[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着不责也。”^{[18]421}可见,司马相如创作周期长是当时闻名的。所以,其屡次对《天子游猎赋》进行加工就很好理解了。再加上司马相如“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6]卷二·4}的赋家之心,也使得他在不断接受到新人物、新事物之际,持之以恒地对其初稿进行修改。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总结汉赋的特点时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7]135}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是汉赋的四大题材,而“体国经野”和“义尚光大”则是汉赋所追求的精神和目标。据徐公持先生的解释:“所谓‘体国经野’,是指辞赋能够体现朝廷意志,传达国家精神,包容覆盖广大社会生活领域;而所谓‘义尚光大’,则说出了汉赋的意义在于崇尚光荣伟大。”^[19]司马相如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和性格的指引下,希望其作品真正能够做到“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也能够最为真实地反映当时那个时代的盛况。尤其是在汉帝国蒸蒸日上,大汉声威日益远播的时代,士人的雄心被普遍唤起,都渴望建功立业。司马相如正是力求以道尽天下万物、总括宇宙众生的文章来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

当然,这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的。《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17]493}又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17]493}就是说文学创作虽有想象的成分,但想象

始终是不可能脱离实际事物的。文章的写作也须经过学养的储备,才识和阅历的丰富,以及文辞的精炼,方能达成。这与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的过程也是吻合的。而这种创作特点也并非司马相如所独有,后之左思作《三都赋》与其似异曲同工。《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左思传》载其:“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茱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20]2376}可见,作大赋是很难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的积累与思考。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从创作到最终定型当有一个过程。司马相如在作景帝的武骑常侍时,就曾侍从汉景帝和梁孝王出猎,那时的景象就为司马相如写作《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后,客游梁,随梁孝王游猎,又使司马相如对天子游猎之事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而写作了《子虚赋》。又经过多年的积累和酝酿,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也确实曾献给汉武帝一篇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天子游猎赋》,且以此得以为郎。但在侍从汉武帝,得见新的上林苑过后,司马相如或许会对曾经的《天子游猎赋》起了修改润色之心。更大的规模,更多的宫观,珍奇的瓜果,新出的人才,以及自己的思想,都会对司马相如的创作产生冲击,促使他对原作进行修改和加工。而这个修改润色的工作或许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直到元狩五年(前118)司马相如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而定稿被司马迁抄录进了《史记》,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子游猎赋》。

三 《天子游猎赋》的礼乐精神与成赋过程之关系

通过前文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和成赋过程的梳理,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的建议了。

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的最后部分写道:“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8]3041}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曲终奏雅,归于讽谏,而分明就是提出了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建议。

此六句,《文选》所录《上林赋》有郭璞注。其注“出德号”为:“号,号令也。”^{[11]129}注“改制度”为:“变宫室车服。”^{[11]129}注“易服色”为:“衣尚黑。”^{[11]129}《文选》所录“更正朔”为“革正朔”,与《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同。郭璞注曰:“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11]129}《文选》所录“与天下为始”为“与天下为更始”,此与《史记》、《汉书》均不同。郭璞注为:“新其事。”^{[11]129}细绎之,郭

璞此注尚有诸多不妥。首先，“衣尚黑”乃是秦制，汉初因袭，无所更改。如果“衣尚黑”，那就是没有“易服色”。其次，据《史记》卷二十六《历书》所载，“殷正以十二月”^{[8]1258}，而汉朝自建国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并无更改，不知郭璞何据。再次，“新其事”不知何解。正如刘跃进先生所言：“其实这最后一句交待得非常清楚不过：‘与天下更始’，乃是就改元而言。”^{[5]146}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这一建议，并非只是改元这么简单。这其实包括了改德、易服、改历以及改元等诸多事项，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当然，这一设想并不始于司马相如。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8]2492}《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所载略同。可见，贾谊在汉文帝初即位之时，就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未被采纳。贾谊之后，汉文帝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前165—前163）的公孙臣、新垣平以及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的赵绾、王臧等人也都曾提出过相同的政见。但因为各种缘故，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始终未能建立。

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以后，随着汉帝国大一统政权的逐步巩固、领土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汉武帝自身好大喜功心态的逐渐升级，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建立就变得迫切起来。司马相如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再一次提出了改德改制的建议。可以说，司马相如的这一提议是符合汉武帝内心的要求的。然而，直到司马相如去世十四年后的元封七年（前104），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9]974-975}的再次建议，以及倪宽与博士赐等“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唯陛下发盛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9]975}的奏议之下，汉武帝才终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8]1402}。正如谢谦先生所言：“始倡于贾谊的改德改制运动终于在汉兴百余年之后完成，这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为其新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在五德终始之运中正式确立了其宗教神学的依据，结束了汉袭秦礼的历史，形成了儒学化的宗教与礼乐文化的传统。”^[21]也就是说，在太初改元、改历、改德、改制以后，属于汉王朝自己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了。

司马相如在汉朝礼乐制度建立中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在《天子游猎赋》中委婉地向皇帝提出了改德改制的建议这么简单，其还曾亲自参与过汉《郊祀歌》十九章的一些创作，最为重要的贡献应该还是献给汉武帝的《封禅书》。班固在《典引序》中曾引用汉明帝评价司马相如《封禅书》的话，其云：“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11]682}可见，汉明帝也认为司马相如上《封禅书》是忠臣之举，因为《封禅书》深深地契合了汉武帝内心对于自己开创的千秋功业进行表彰的渴望。

可以这样说，《封禅书》是司马相如礼乐思想的结晶，而《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改制的提议则是《封禅书》的萌芽。我们可以想见，《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改制的内容，在最初献给汉武帝的时候是没有的，也是其后加工润色的结果。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的汉武帝虽然已有大展雄图霸业之心，但毕竟刚刚摆脱窦太后的束缚，一切功业尚未实施。正如班固在《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中所说的一样：“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9]2633}如果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建议皇帝改德改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贾谊在汉文帝初即位时即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但汉文帝“谦让未遑”，就是因为自己刚刚即位，尚无功德于国家，不敢草率行事。此时的汉武帝也是一样。

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威服闽粤以来，数击匈奴，开西南夷，降东夷，通西域，祥瑞屡见。此时，司马相如再提出改德改制的建议就显得合乎时宜了。《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用事希。”^{[8]1355}可见，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资格封禅的。司马迁将封禅的条件归结为“受命于天”、“符瑞见”、“有功德”和“有暇给”。元狩中（前122—前117）的汉武帝已经具备了上述所有的条件，所以司马相如也就在《天子游猎赋》提出改德改制建议的基础上，将其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思想萌芽进一步完善，最终总结而成《封禅书》。其在《封禅书》中盛赞大汉之德说：

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漫衍，旁魄四塞，云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沂八埏。怀生之类霑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迳陝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晷，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围

驹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兽,稻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觝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囿,冥于间馆。奇物谲诡,傲倪穷变。^{[8]3065}

司马相如在这里赞叹汉德,歌颂武功,列举祥瑞。正如孙少华先生所说:“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心’之作,其‘体物写志’,也是意图学《诗》之‘言志’,具有一定的政教功能。”^[22]也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宣上德而尽忠孝”^{[10]21}。所以,司马相如的这些言论,不仅是为了打动汉武帝,也是其礼乐思想的体现。这是对改德改制的延伸,将改德改制推向了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最高点——封禅。而汉武帝也在司马相如去世后八年,终于封禅于泰山。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并非一时创作而成,而是在多年当中,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最终定稿,而被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确实曾进献给汉武帝一篇《天子游猎赋》,并以此为郎,又出使西南夷,后被免官,又复以为郎。在其多年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见证,以及自身创作特点和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又对《天子游猎赋》进行了诸多修饰和润色。所以赋中方出现了许多建元中(前140—前135)的司马相如不可能得知之事。而《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的建议恐也是后期加工润色的成果,体现了其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思想,并最终在《封禅书》中得以完善。

注释:

①《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葡萄宫,在上林苑西。”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4页。

参考文献:

- [1]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2]简宗梧.汉赋史论[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
- [3]康金声.汉赋纵横[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4]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 [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6]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J].江汉论坛,2007,(2).
- [7]韩晖.《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汉官六种[M].孙星衍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1]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沈伯俊.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猎赋》[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 [1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5]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6]葛洪.西京杂记[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18]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9]徐公持.“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J].文学遗产,2010,(1).
- [2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1]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 [22]孙少华.汉代赋论的文学实践与时代转换[J].文学评论,2015,(5).

[责任编辑:唐 普]